

产业链转移及其东北亚趋向研析

李清如

内容提要：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经历多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为分析当前产业链转移提供重要框架。然而，在新国际环境下，经典理论的解释力面临挑战。当前，全球价值链正处于深度重构的关键期，地缘政治因素的渗透对全球产业链布局产生深远影响，作为第四轮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和第五轮产业转移的核心参与者，中国制造业外迁的相关问题备受关注。东北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板块，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呈现新的趋向。区域间，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产业链融合度显著提升，中国与东盟、墨西哥的产业链关联不断增强。区域内，中日、中韩之间的产业链关联度较高，中国既是增加值的重要输出地，也是日韩增加值的主要吸收地；俄蒙对中国产业链依赖度较高，但与日韩产业链关联相对较弱。东北亚地区的产业链合作对于维护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产业链 国际产业转移 比较优势 地缘政治 产业外迁

作者简介：李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制造业产业链转移的测度与路径优化研究”（24CGJ0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碳解锁效率的统计测度与优化路径研究”（23BTJ035）

中图分类号：F1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98/j.cnki.dbyxk.2025.03.003

文章编号：2095-3453（2025）03-0000-25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承接国际产业链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体系完善、技术引进和吸收、就业和人才培养都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全球经济局势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部分产业链外迁趋势明显。这其中既有扩大海外市场、优化产业链布局的主动转移,也有受地缘政治因素和保护主义政策影响的被动转移。产业链转移问题关系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对其理论演化和现实前沿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与全面厘清,从而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进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参考。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回顾与理论演化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过多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也随之产生并不断演化。这些理论大多与国际贸易理论、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并主要围绕为什么转移(即转移动因)、怎样转移(即转移模式)和转移产生的结果(即转移效应)这三个核心议题进行阐释。

(一)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回顾

一般认为,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促进英国产业高度发展,同时也产生国内生产成本提高、市场容量不足等问题。为此,英国开始向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北美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而欧洲国家和美国借助此次产业转移,迅速推进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为后续的经济崛起奠定基础。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二战后美国确立全球经济领先地位,开始主动调整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钢铁、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向正处于经济恢复期的日本、西德等国家转移。通过承接此次转移,日本迅速从战后恢复期进入高速增长期,并凭借高效的生产模式以及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逐步成长为制造业强国,构建起涵盖汽车、电子、机械等多领域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①

在承接上一轮产业转移之后，日本成为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者。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为应对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将纺织、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能耗大、污染严重的重工业以及汽车、家电等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NIEs）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迎来发展良机，以出口导向型模式带动经济快速增长。进入90年代后，日本、美欧、NIEs将加工装配制造业等大量向中国大陆和部分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大陆成为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此轮转移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呼应，推动造就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1990年至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由1.8%增长至10.3%。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②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

产业转移动因解释的是为什么国际产业转移会发生，这是产业转移理论的核心议题，其主要是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建立和延伸而来的。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解释国际产业转移奠定基础。前者认为各国在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 and 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前提。^③后者认为国际贸易的根源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

① 关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存在不同的观点，每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也并不是严格划分的，笔者选取的是较为折中的观点。一些学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参见卢根鑫：《国际产业转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潘悦：《国际产业转移的四次浪潮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23—27页；岳圣淞：《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中国与东南亚：比较优势与政策选择》，《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第124—149页；刘振中、严慧珍：《四次国际产业大转移的主要特征及启示》，《宏观经济管理》2022年第8期，第72—81页。

②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World Bank Group,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025-01-25].

③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①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要素禀赋学说（H-O理论）进一步提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丰富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因此，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富的国家，资本成本相对较低，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②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经济活动会从相对成本较高、已不具备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相对稀缺的国家和地区转向相对成本较低、具备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这就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前几次国际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基本遵循这一规律。资本丰富、技术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依赖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相对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以充分利用各自的要素禀赋，集中发展相对优势产业。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一些经典理论进一步进行拓展，应用较为广泛的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

其中，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前提，基于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探寻产业转移的动因，从而对产业和产品的转移规律做出系统性归纳。^③ 该理论将产品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创新阶段、成熟阶段、标准阶段。随着产品技术由新产品向成熟产品、再向标准化产品转化，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也会表现不同的特征。在创新阶段，技术成为驱动产品开发与制造的核心要素，产品呈现典型的技术密集型特征；

① 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817.

② Eli Heckscher, "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konomisk Tidskrift*, Vol. 21, No. 6, 1919, pp. 497-512. Bertil Ohlin,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③ 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0, No. 2, 1966, pp. 190-207.

进入成熟阶段，生产技术逐渐普及，资本投入成为推动产品规模化生产的关键，产品要素密集度向资本密集型转化；最后到标准阶段，产品生产技术高度标准化，产品要素密集度也转为劳动密集型。因此，生产活动在产品的不同阶段会向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转移，最终形成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

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则主张将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原理”之上。^①该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应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出口其产品，缩减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并进口其产品；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一国应从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对外投资，将其转移到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②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的顺序，首先转移的是那些在本国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和技术进步，逐渐转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部分环节或相对落后的技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与日本主导的20世纪60—70年代向东亚NIEs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相辅相成，反映后起经济大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寻求产业发展的路径。^③

此外，海默和金德尔伯格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更侧重从微观角度对产业转移动因进行分析。^④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时，预期回报的国际差异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垄断优势才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相较于短期超额利润，跨国公司更希望获得长期收益。这些垄断优势包括技术（如先进的生产技术、专利）、资本优势

① Kiyoshi Kojima, “A Macroeconomic Approach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4, No. 1, 1973, pp. 1–21. Kiyoshi Kojima, “Japanese and America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6, No. 1, 1985, pp. 1–35.

② 参见刘祥生：《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介评及其启示》，《国际贸易问题》1992年第12期，第54—57页。

③ 参见李东阳：《边际产业扩张论及其启示》，《现代日本经济》1988年第6期，第59—61页。

④ Stephen Hymer,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0. Charles P. Kindleberger, *American Business Abroad: Six Lectures on Direct Invest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如融资能力和资金调配能力、财务运营能力)、组织管理(如管理经验、组织体系和人才)、营销优势(如品牌效应、营销网络)等,这是投资国当地公司并不具备的,正是这些优势促使跨国公司做出迁往国外的决定。跨国公司凭借这些垄断优势,能够克服在海外经营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成本,如政策法规差异、信息不对称、文化差距等,在国外市场获得比当地企业更高的利润。即使在海外投资可能面临短期风险和成本增加,但从长期看,依靠垄断优势可获取丰厚的长期收益。^①

(三) 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

产业转移的模式涉及区位选择、转移方式等问题。实际上,在关于产业转移动因的分析中,很多理论已经对产业转移模式作出过相应解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当产品处于创新阶段时,创新国(通常是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使创新国处于优势地位,企业更关注国内市场,用于出口的部分有限;到成熟阶段,发达国家国内市场逐渐饱和,产品将出口至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产品生产技术日趋成熟并被大量仿制,一部分生产逐渐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完成;进入标准阶段之后,产品已经形成高度标准化的生产体系,价格竞争成为主流,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成本优势直接应用已经设计好的生产技术,此时发展中国家就成为吸引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生产据点,并开始向更发达的国家出口产品。^②这说明,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在产业转移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此类似,前述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和垄断优势理论也从直接投资的角度对跨国公司带动的产业转移作出分析。

在众多的理论体系中,“雁阵模式”理论由于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解读而广受关注。^③“雁阵模式”理论最初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30

① John H. Dunning, Alan M. Rugman, “The Influence of Hymer’s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1985, pp. 228–232.

② Edward E. Marandu, Tebo Ditshweu, “An Overview of the Key Theori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Way Forward,”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Vol. 5, No. 12, 2018, pp. 30–39.

③ 参见车维汉:《“雁行形态”理论研究评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3期,第88—92页。

年代提出,用于描述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该理论通过观察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发现后发国家的产业演进会经历从进口到国内生产再到出口的工业化赶超过程,类似于雁群飞行的V形队列,即“雁阵”,因此得出结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逐步实现产业升级。^①此后,“雁阵模式”被广泛用于解释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产业转移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中国沿海省份。这些经济体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形成“雁阵式”的发展梯队。^②“雁阵模式”为理解东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框架,不仅适用于国家间的产业转移,也可以用于分析经济体内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③

从产业层面来说,产业聚集理论融合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成为解释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和机制的理论工具。早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等均为产业聚集理论提供基础。^④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则通过引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以及运输成本等要素,构建“中心-边缘”模型,将产业聚集研究拓展至空间经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在“中心-边缘”模型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由规模经济、运输成本 and 市场需求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活动会自发地向某些区域集中,形成“中心”,而其他区域则成为“边缘”。^⑤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地方进行生产,从而更接近消费者、了解市场需求,并可以

① Kaname Akamatsu,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1, No. S1, 1962, pp. 3–25.

② Kiyoshi Kojima, “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1, No. 4, 2000, pp. 375–401.

③ 参见蔡昉、王德文、曲玥:《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第4—14页。

④ 参见段学军、虞孝感、陆大道、Josef Nipper:《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研究及其意义》,《地理学报》2010年第2期,第131—138页。

⑤ Paul 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9, No. 3, 1991, pp. 483–499.

减少产品运输成本。而产业一旦在某地区集聚形成核心区域,就具有路径依赖性,后续会吸引更多相关产业转移过来,形成产业聚集。随着“中心”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如土地价格上涨、竞争加剧等,企业就会考虑再次进行转移,形成新的“中心-边缘”格局。

从微观层面来说,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如何进行区位选择是重点,诸多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其中,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在总结垄断优势理论、区位理论、内部化理论等前期理论的基础上,将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类型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四种类型,认为跨国公司只有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这三种优势时才会选择跨国投资。^① 这为分析跨国公司如何选择产业转移的目标国家和地区提供一个系统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发达国家的企业通常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优势使其能够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具有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和市场需求,这些区位优势可以吸引跨国公司进行产业转移;跨国公司通过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等方式进行内部化生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控制技术、确保产品质量,避免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②

(四) 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

在经典理论中,一般认为,产业转移对于相关各方都存在一定的正向效应,同时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产业转移会使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使各国要素得到更充分利用和更有效配置,增加国民收入和就业。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随着产品不同阶段的演变,技术和产业会向不同国家和地区转移,从而促进技

① 参见李清如、常思纯:《印太视域下日本ODA的经济效应:基于OFDI与区域供应链的探究》,《日本学刊》2022年第2期,第36—63页。

② John H. Dunning,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B. Ohlin, P. Hesselborn, P. Wijkman,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pp. 395-418. John H. Dunning,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9, No. 1, 1988, pp. 1-31.

术扩散和产业升级。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产业转移有助于投资母国优化产业结构,避免资源浪费;东道国则可通过承接边际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技术水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凭借垄断优势进行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实现生产和销售的优化布局,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东道国也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经济增长。“雁阵模式”理论认为,产业转移可以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使后发国家能够利用外部资源和技术实现产业升级,从而推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市场接近性、要素成本差异等因素促使企业选择最优区位,并吸引相关上下游产业集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产业转移能使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实现生产的优化配置;东道国也能吸引外资和技术,促进产业发展和就业。

总结上,从全球范围来看,产业转移能够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增加世界总产出;从区域层面来看,能够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和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从国家和地区层面来看,转出国和承接国均可以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增加就业和收入,优化产业结构;转出国可以集中于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转出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利用承接国的资源和要素优势,获取更高利润;承接国则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同时,国际产业转移的负面效应方面,对于转出国来说,可能会面临国内产业结构单一、产业空洞化风险。对于承接国来说,可能会过度依赖具有比较优势的某种要素密集型产业,而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生产环节;本国市场受到冲击,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产生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难以建立自主创新体系。

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做出拓展研究和实证检验。一些研究关注产业转移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认为,产业转移通过垂直产业链促进技术扩散,提升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技术扩散和生产效率构成东道国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① 东道国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建立前后关

^① John Humphrey, Hubert Schmitz,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 Vol. 36, No. 9, 2002, pp. 1017-1027.

联,可以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由于来自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东道国企业也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最终推动制造业新产品开发和生产效率改善,实现产业升级;^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开始只是承担简单的组装工作,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品牌商和零售商合作,能够提升产品设计、质量控制以及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随着技术和经验的积累,一些企业可以实现从简单组装到贴牌生产再到自主品牌的升级过程。^②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产业转移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认为,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对不同技能劳动者和不同类型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有差异,^③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可以造就大量就业机会,尤其是在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同时,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高技能劳动者受益更多,这是因为在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同时,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也在增加,以满足承接产业转移的技术升级和管理需求,而这有可能加剧收入分配不均衡现象;^④对于那些与跨国公司紧密联系的企业,其员工工资增长更为明显,反映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企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会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⑤对于产业转出的国家(通常是发达国家)而言,产业转出对当地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分配产生显著影响,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下降幅度更大,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⑥

① Albert Guangzhou Hu, Gary Jefferson, Qian Jinchang, "R&D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7, No. 4, 2005, pp. 780-786.

② Gary 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48, No. 1, 1999, pp. 37-70.

③ Frank Barry, Frank Walsh, "Gains and Losses from Sectoral Relocation: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 19, No. 1, 2008, pp. 4-16.

④ Robert Feenstra, Gordon Hanson, "Globalizatio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2, 1996, pp. 240-245.

⑤ Gordon Hanson, Ann Harriso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in Mexico," *ILR Review*, Vol. 52, No. 2, 1999, pp. 271-288.

⑥ David Autor, David Dorn, Gordon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No. 6, 2013, pp. 2121-2168.

此外,一些研究还重点关注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推动区域经济分工与协作,产业集聚效应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还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提升周边地区的产业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①但同时,产业转移也可能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具有集聚优势的地区,集聚经济通过知识溢出、劳动力市场共享等外部性,提升集聚地区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使得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②而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也会吸引更多资源和要素向特定区域集中,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③

二、产业链转移的前沿问题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产业分工不断细化分割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生产环节,国际产业转移逐渐演变成为产业链部分环节甚至全产业链的转移,关于产业链转移的研究也备受关注。^④当前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正处于深度重构的关键期。地缘政治因素的不断渗透对全球产业链布局产生深远影响,产业链转移也呈现新趋势。产业链的安全与韧性成为各国关注焦点,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障产业链稳定运行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作为第四轮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和第五轮产业转移的核心参与者,中国制造业外迁的现象、趋势及路径也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 地缘政治因素对产业链的冲击

地缘政治已成为影响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因素。在上述对产业链转移基

① Michael Greenstone, Richard Hornbeck, Enrico Moretti, “Identifying Agglomeration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Winners and Losers of Large Plant Opening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8, No. 3, 2010, pp. 536–598.

② Masahisa Fujita, Jacques-François Thisse,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 10, No. 4, 1996, pp. 339–378.

③ J. Vernon Henderson, “Marshall’s Scale Econom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53, No. 1, 2003, pp. 1–28.

④ 参见唐宜红、张鹏杨:《提升对外迁产业供应链的可控力: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问题研究》,《开放导报》2022年第4期,第7—14页。

基础理论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基本是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分析成本、市场、资源等经济要素对产业布局的影响。然而,地缘政治动荡、保护主义兴起、大国博弈加剧,这些因素正强烈冲击着产业链重构的进程。从国家层面来看,地缘政治竞争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日益显著,主要经济体围绕关键技术激烈争夺,美西方以供应链武器化、对华技术遏制政策谋求阻碍中国技术发展,催生“近岸外包”“回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概念;从企业角度而言,在进行产业转移决策时,除考虑经济效益,还需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考量范围。^①这种变化使得产业链转移背后的政治因素逐渐被重视。

一些研究关注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产业链转移的趋势和机制机理。近年来,大国战略竞争引发产业链的地缘政治转向,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贸易保护、投资限制、技术封锁等手段,阻碍产业链各环节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原有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②国家权力日益介入产业链调整过程中,经济安全成为一些大国生产布局的优先关切,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优势不仅被用于对他国的战略竞争和遏制,还被用来胁迫第三方“选边站”。^③国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企业的行为,作为主导产业链转移的微观主体,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战略导向随之发生改变。企业在成本考量之外,更加注重供应链的安全性、韧性,为降低风险,企业会重新评估全球生产布局,倾向于将产业链向政治稳定、政策友好的地区转移,推动产业链区域化、近岸化发展。^④

一些研究对具体行业和典型案例做出分析。在关键战略资源领域,对关键矿产和重要产业链主导权的争夺是此轮大国竞争的焦点,美国在产业链控制、联盟制华战略主导下,力推稀土等关键资源产业链重构,以掌握

① Dan Ciuriak, “The Economics of Supply Chain Politics: Dual Circulation, Derisking and the Sullivan Doctrine,” Verbatim, C. D. Howe Institute, 25 May, 2023.

② 参见刘洪钟:《地缘政治经济视角下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4年第2期,第48—67页。

③ 参见管传靖:《大国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的地缘政治转向》,《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第48—167页。

④ 参见竺波亮:《地缘政治竞争和全球价值链》,《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3期,第6页、第58—73页。

在清洁能源、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主导权。^①在能源领域，美国搅动地缘政治冲突导致能源供应不稳定、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不仅影响能源行业自身，还通过产业链传导，影响下游众多产业的成本和运营，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各国和企业纷纷调整能源供应链布局，寻求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渠道和合作方式。^②作为分析产业链转移的典型案例分析，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显著影响，苹果公司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逐渐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印度、越南等地，但这一过程充满挑战，反映国家力量对市场的严重干扰。^③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挑战和应对。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协同性和稳定性遭到破坏，严重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市場不确定性，给全球产业链带来诸多挑战。^④就中国而言，产业链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如何保持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稳定面临压力与挑战。^⑤在关键技术领域，中国受到国外技术封锁、关键技术断供等威胁，阻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进程。^⑥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应加强自主创新，提升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确保区域产业链的通畅与稳定。^⑦国际社会也应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维护全球产业链的

① 参见杨丹辉、高风平、刘思艺、弓宇峰：《地缘政治与战略资源产业链重构：以关键稀土矿产和材料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年第5期，第19—33页。

② 参见孙倩、薛进军、孙克娟：《地缘政治演变与全球能源供应链重建》，《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第121—245页。

③ 参见李巍、许悦：《地缘政治回归与国际产业地理变迁：以苹果公司的供应链战略调整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期，第71—107、173—174页。

④ 参见张兴祥、杨子越：《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供应链安全及中国的应对策略》，《亚太经济》2023年第2期，第1—10页。

⑤ 参见郑建明、杨策、王万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视角》，《国际贸易》2020年第9期，第31—75页。

⑥ 参见张辉、吴尚、陈昱：《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动力及中国应对》，《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54—67页。

⑦ 参见沈铭辉、李天国：《全球价值链重构新趋势与中国产业链升级路径》，《新视野》2023年第2期，第70—78页。

稳定与发展。^①

（二）产业链安全与韧性的制度构建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下如何提升安全与韧性，是与产业链转移密切相关的问题。产业链安全与韧性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然而，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以及技术的快速变革，使得在新一轮产业链转移和重构过程中，我国产业链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风险。^② 因此，提升产业链安全与韧性，避免因外部冲击导致产业断链，确保经济稳定运行就成为重中之重。

一些研究基于国际视野，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产业链安全政策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产业链安全与韧性的提升机制及政策建议。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出台关键产业供应链韧性重塑计划，加强对关键产品和产业的国内控制；试图通过强化本土制造、构建盟友供应链等举措，推动美国制造业振兴和回流，提升关键产业供应链自主性与安全性，减少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中强化美国的主导地位。^③ 日本一方面追随美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强化与以美国为首的盟友的合作；另一方面，不断提升所谓供应链安全保障，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加大对东盟、印度、非洲南部等新兴市场的投资。^④ 欧盟则通过区域协同发展，整合内部资源，加强关键技术研发投入，推动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竞争力。^⑤ 我国应加强战略规划，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国际合作，构建多元化供应链体系，提升关键技

① 参见罗仪馥：《以真正的多边主义破解全球产业链的地缘政治困局》，《中国对外贸易》2024年第12期，第66—67页。

② 参见吕越、陈泳昌：《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时代背景、风险挑战与靶向进路》，《学术论坛》2024年第2期，第58—67页。

③ 参见曾燕萍、张亚鹏、史亚东：《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对华影响与对策建议》，《情报杂志》2024年第7期，第73—80页；李向军、李萌萌：《美国关键产业供应链韧性重塑计划及启示》，《宏观经济管理》2023年第3期，第83—90页。

④ 参见徐博、张君达：《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调整下日本资源外交新动向》，《日本学刊》2025年第1期，第42—150页；崔健、陈子琪：《世界大变局下日本供应链安全政策调整及对中国的启示》，《东疆学刊》2025年第1期，第59—144页。

⑤ 参见郝宇彪、明莹：《美日欧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逻辑解构与比较分析》，《国际展望》2024年第4期，第37—167页。

术自主可控能力。

还有一些研究对集成电路、汽车、粮食、能源等重点领域产业链进行分析,并探讨如何构建我国关键产业链安全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在集成电路领域,研究指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光刻机、高端芯片设计等关键环节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存在关键技术依赖进口、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风险,需加大研发投入,培育本土企业,完善产业生态,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①在汽车产业领域,我国汽车产业链在全球地位逐步提升,但在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方面仍需加强,需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协同能力。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技术、自动驾驶技术等方面,仍需突破技术瓶颈,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作与配套。^②在粮食和能源领域,为保证稳定供给,一方面应加强储备体系建设,降低对外依赖度;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和能源治理,加强与产粮国、能源输出国的合作,建立稳定且多元化的供应渠道。^③

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时代,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指引,提升产业链安全与韧性的逻辑与路径受到重点关注。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提升产业链韧性。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企业生产流程、提高协同效率,增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信息共享与协作能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链提供支撑,能够促进数据流通与资源配置优化,从而保障产业链安全,在风险冲击下保持稳定。^④另一方

① 参见李先军、龙雪洋:《新形势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演进态势、主要风险与对策建议》,《技术经济》2024年第7期,第18—27页。

② 参见吕越、邓利静:《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以中国汽车产业链为例的测度及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23年第2期,第1—19页。

③ 参见韩冬、钟钰:《地缘因素对我国粮食进口韧性的冲击与政策响应》,《国际贸易》2023年第9期,第52—61页;朱彤:《能源安全新风险与新逻辑:系统韧性的视角:兼论新逻辑下我国能源安全问题与战略思路》,《技术经济》2023年第2期,第1—10页。

④ 参见钞小静、廉园梅、元茹静、陈思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链韧性:基于产业链恢复能力数据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第11期,第112—131页;李玉梅、许晗、宋玉茹、高鹤鹏:《数字经济与产业链韧性提升:机制、难点与对策》,《科学管理研究》2024年第2期,第64—72页;余东华、黄念:《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产业链韧性吗?》,《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年第8期,第81—102页。

面,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创新产品服务,提升生产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从而增强产业链竞争力与制造业韧性。^①同时,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通过创新驱动、要素升级等路径赋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技术、新模式,能够打破原有的传统产业链局限,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升产业链应对风险的能力。^②

(三) 中国产业链外迁的特征及应对

中国是第五轮产业转移的主要参与者。与前四轮产业转移基本遵循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从相对低端产业开始转移的规律有所不同,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中高端产业链环节向发达国家回流和中低端产业链环节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流的双重压力。^③这种产业链外迁的现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远,影响国内制造业和就业,但通过倒逼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也将带来新的机遇。^④因此,深入剖析中国产业链外迁的动因、特征及影响,并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对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保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研究关注于中国产业链外迁的动因、模式与影响。在外迁动因方面,当前中国产业链外迁的驱动因素既包括经济因素,也涉及非经济因

① 参见师傅、阮连杰:《人工智能时代下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风险及应对》,《改革》2024年第11期,第17—27页;张伯伟、马凡慧:《智能制造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经济学动态》2024年第11期,第20—37页;何茜茜、高翔、黄建忠:《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来自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证据》,《国际贸易问题》2024年第2期,第71—89页。

② 参见张夏恒:《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64—70页;宋佳荣、同雪莉:《新质生产力如何影响产业链韧性: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统计与决策》2024年第14期,第17—22页;张杰、周艳菊、王宗润:《新质生产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理论框架与路径研究》,《当代经济管理》2024年第10期,第15—26页。

③ 参见田开兰、杨翠红:《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提升我国价值链水平策略研究》,《今日科苑》2023年第2期,第26—74页。

④ 参见刘情、张海波:《我国制造业产业外迁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科技与经济》2024年第6期,第91—95页;张晓旭、祝坤福、汪寿阳:《中国制造业转移到印度对中国GDP和就业的影响分析》,《计量经济学报》2024年第4期,第924—959页。

素，其中非经济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外迁产生较大压力。^①从经济因素来看，企业外迁主要出于成本驱动（即追求较低生产成本）、产业布局驱动（即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战略性资产或更广阔市场）、国际合作驱动（即依托国际合作平台或利用区域经贸协定）等目的。同时，地缘政治、保护主义等非经济因素也在推动产业外迁，一些企业不得不被动调整其产业布局。^②在外迁模式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对成本较为敏感，率先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③与加工贸易联系紧密的制造业加工环节加速外迁；^④高端技术制造业回流至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趋势也日益显现。^⑤外迁部门会逐渐寻求国外的中间产品供应网络，部分乃至全部替代国内产业链，从而对我产业链完整性和布局调整产生不利影响；^⑥高端制造业会阻碍国内企业通过技术溢出和产业链关联提升价值链质量，使我国面临“低端锁定”和“高端受制”风险。^⑦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于内外资企业在中国产业链外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尤其对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现象进行重点研究。外资企业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科技压制和贸易投资管控等措施反应更为敏感，多重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因素叠加，加速部分在华外资企业外迁。^⑧例如美国“友岸外包”战略的推进促使部分在华美资企业

① 参见徐奇渊：《全球产业链重塑背景下的产业外迁》，《金融论坛》2022年第8期，第3—6页。

② 参见吕越、王者、于喆宁：《全面认识产业转移的新特征新模式——基于开放视角下的事实与分析》，《南方经济》2024年第9期，第117—134页。

③ 参见冯宗敬：《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外迁：研判与应对》，《中国外汇》2022年第23期，第57—58页。

④ 参见洪俊杰、陈洋、杨志浩：《中国产业转移的战略考量：特征、动因与政策展望》，《国际贸易》2024年第7期，第11—21页。

⑤ 参见刘莹、彭思仪：《中国产业链转移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12期，第118—128页。

⑥ 参见胡国良、王继源：《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外迁问题研究》，《财贸经济》2020年第1期，第50—64页。

⑦ 参见高敬峰、王彬、宋玉洁：《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国内价值链质量的影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第121—137页。

⑧ 参见卢进勇、陈虹曦、王粉粉：《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影响及应对策略》，《国际贸易》2024年第1期，第58—65页。

将生产线转移至墨西哥等邻近国家。^①其次，内资企业的外迁则更多受到国内产业升级压力和全球化战略的驱动，国有企业贯彻实施国家“走出去”战略，民营企业面向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地区，国内竞争的加剧也在推动内资企业向外迁移。^②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或设立生产基地，逐步实现从“产品输出”向“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的转变。^③此外，研究还发现，政策环境对内外资企业的外迁决策也有不同影响，外资企业的外迁往往受外资来源国对华竞争战略与产业回流政策影响，而内资企业的外迁则更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④

从承接方的角度来看，东盟、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在承接中国产业外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东盟国家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加工装配环节转移的主要目的地；^⑤印度通过推行“印度制造”战略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大量中国制造业企业；^⑥墨西哥则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近岸外包”战略，成为中国企业进入北美市场的重要跳板。^⑦然而，这些承接国在产业配套能力、劳动力素质和政治稳定性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在享受产业转移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环境压力和社会

① 参见邢李志、殷思梦、张鹏杨：《美国友岸化近岸化战略下我国产业转移的测度与分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知网平台在线首发，2024年9月4日。

② 参见杨枝煌、陈尧：《中国产业对外转移的基本特征、主要问题及提升策略》，《国际贸易》2022年第11期，第19—42页。

③ 参见罗志恒：《中国产业外迁与企业“出海”》，《中国改革》2024年第6期，第26—31页；尹杰、高翔、杨翠红：《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测度模型及对中国的实证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5期，第1421—1436页。

④ 参见杨皓森：《中国制造业转移态势分析：基于全球产业大数据》，《经济与管理》2024年第6期，第39—46页。

⑤ 参见何冬妮、史永丽：《东盟国家产业转型的动因、特点、影响及中国的应对》，《国际关系研究》2024年第1期，第112—159页；秦北辰：《东南亚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困境与机遇》，《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4期，第40—155页。

⑥ 参见罗文宝：《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印度制造业优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南亚研究季刊》2023年第2期，第55—158页。

⑦ 参见杨盼盼：《全球产业链调整下的墨西哥经贸发展》，《中国外汇》2023年第17期，第24—26页。

会治理问题，可能制约其承接产业转移的长期效果。^① 中国企业的外迁不仅带动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还通过技术溢出和资本输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② 中国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中西部地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优势，培育重点产业链生态，发挥大市场和全产业链优势；另一方面加强与承接国的政策协调，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产业分工格局。^③

三、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东北亚趋向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不仅是产业布局的空间变迁，更是技术创新、要素成本、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东北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板块，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呈现出新的趋向。从区域间来看，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区域产业链融合度更高，中国与东盟、墨西哥的产业链关联显著增强。从区域内来看，中日、中韩具有较高的产业链关联，中国既是增加值的重要输出地，也是日韩输出增加值的主要吸收地；俄罗斯、蒙古国对中国的产业链依赖度较高，与日韩的产业链关联则并不太显著。

（一）从区域间来看，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区域产业链融合度更高

东盟以及印度、墨西哥等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一些从中国转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装配制造业大量流入这些地区。东北亚是东南亚吸收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中资、日资、韩资企业近年纷纷加大投资力度，在东盟建设工厂或扩大产能。根据东盟发布的投资报告显示，2023年东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达到历史最高值，中国大陆、中国香

① 参见刘娅、梁明、徐斯等：《中国制造业外迁现状与应对策略：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性的分析》，《国际贸易》2023年第5期，第3—13页；苗翠芬：《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行业特征、动因及其影响研究》，《中国物价》2024年第9期，第79—85页。

② 参见蔡琦晟、郭于玮、鲁政委：《全球产业链重塑趋势：产业转移的视角》，《金融与经济》2024年第9期，第54—64页。

③ 参见刘佳骏：《制造业外迁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协同关系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54—63页；韩力、王宏伟：《对比墨越印我国中西部如何增强承接产业转移优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2024年第6期，第44—49页。

港、日本、韩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东盟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①这种跨国企业带来的产业转移使得东道国和母国的产业链关联更加密切，在东道国生产经营的企业往往会从母国进口所需要的中间品用于生产、加工和出口，这使得在东道国的出口中也会包含来自母国的增加值。同时，出于地理临近、通关便利、工业体系健全、供应链稳定等优势，在东盟生产经营的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也会倾向于从中国等地进口零部件和设备用于加工生产。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进一步推动产业链融合，中国、日本和韩国企业可以在RCEP成员国范围内更有效的配置资源。例如一些日本企业将在中国的一部分中低端环节转移至东盟，而在中国保留一部分中高端环节，从而形成日本—中国—东盟的产业链布局，最终产品出口至美国、中国、日本。

表1是东北亚地区在东盟以及印度、墨西哥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其从东北亚地区进口的中间品占其全部进口中间品的比重。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所使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为ADB MRIO2022。从表1可以看出，东北亚地区在东盟出口所包含的外国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呈上升态势，由2007年的23.1%上升至2021年的34.3%，相当于1/3的外国增加值是来自东北亚地区。同时，东北亚地区在墨西哥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由2007年的20.0%上升至2021年的28.5%。这一方面说明一些企业为靠近消费市场、获取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而进行聚集；另一方面说明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一些企业为绕过贸易壁垒、避免关税制裁而转移至临近美国且成本相对较低的墨西哥。东北亚地区在印度出口所包含的外国增加值中所占比重也基本呈上升态势，但不如在东盟、墨西哥明显。进口中间品比重也显示出大致相同的趋势。2021年，在东盟进口的全部中间品中，来自东北亚地区的比重达到35.3%。而这一比重在印度和墨西哥分别为16.6%和24.6%。可以看出，与印度、墨西哥相比，东北亚与东南亚产业链的关联性更强。

^①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24: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2025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ASEAN Secretariat, October 2024, <https://asean.org/book/asean-investment-report-2024-asean-economic-community-2025-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 [2025-02-12].

表1 东北亚地区在东盟、印度和墨西哥的出口增加值比重和进口中间品比重

年份	出口增加值比重 (%)			进口中间品比重 (%)		
	东盟	印度	墨西哥	东盟	印度	墨西哥
2007	23.1	12.3	20.0	23.3	11.5	15.0
2008	23.9	13.0	20.2	25.2	11.4	14.8
2009	26.8	13.3	20.2	28.5	11.5	15.3
2010	25.9	12.9	22.1	27.0	11.9	16.7
2011	25.1	14.7	22.7	26.1	15.2	16.8
2012	25.7	13.9	21.8	26.9	12.7	16.6
2013	25.7	14.3	22.8	26.4	12.8	17.1
2014	28.1	15.7	21.7	29.0	14.5	16.9
2015	27.7	16.1	22.0	29.0	14.9	17.6
2016	28.6	18.6	22.9	27.4	18.2	18.2
2017	29.1	18.9	22.8	27.9	18.3	17.7
2018	30.1	16.2	23.8	29.9	13.5	19.0
2019	33.0	15.6	25.9	33.9	15.0	21.5
2020	35.4	18.4	26.8	36.0	17.6	22.2
2021	34.3	17.9	28.5	35.3	16.6	24.6

注：增加值比重指东盟以及印度、墨西哥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来自东北亚地区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进口中间品比重指其进口的全部中间品中，来自东北亚地区的中间品所占的比重。东北亚地区包括中日韩俄蒙五国；东盟包括除缅甸外的东盟九国，缅甸数据未在数据库中单独列示。

资料来源：“UIBE GVC Database”，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http://gvcdb.uibe.edu.cn> [2025-02-12]。

东北亚与东南亚产业链关联性的增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产业链向东盟国家的延伸。从表2可以看出，2021年，在东盟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中国占比达到20.4%，日本和韩国分别占比6.7%和5.4%，是东盟主要的增加值来源地，俄罗斯和蒙古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较低。表2仅列出2021年的情况，实际上，从时间趋势来看，中国的增加值比重是由2007年的7.5%逐渐上升至2021年的

20.4%，而日本和韩国的增加值比重则基本是保持上下波动的状态。对于印度来说，其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中国占比并不很高，且从时间趋势上看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日本、韩国、俄罗斯甚至要更低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中国—东南亚”和“中国—印度”两种产业链转移模式的不同。“中国—东南亚”模式强调互补性，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品仍依赖于中国供应链体系，中国国内产业链与转移至东盟的产业链形成自然嵌合关系，相当于国内产业链的延伸。“中国—印度”模式则体现竞争性，承接地利用本国供应链体系形成完整产业链，以摆脱对中国依赖，形成竞争格局。^①

表2 2021年东北亚各国在东盟、印度和墨西哥的出口增加值和进口中间品比重

	出口增加值比重（%）			进口中间品比重（%）		
	东盟	印度	墨西哥	东盟	印度	墨西哥
中国	20.4	10.7	19.2	20.5	9.8	17.5
日本	6.7	2.2	4.2	7.3	2.0	3.2
韩国	5.4	2.2	4.3	6.6	2.6	3.7
蒙古国	0.0	0.0	0.0	0.0	0.0	0.0
俄罗斯	1.7	2.7	0.8	1.0	2.2	0.2

资料来源：“UIBE GVC Database”，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http://gvadb.uibe.edu.cn> [2025-02-12]。

（二）从区域内来看，中日、中韩具有较高的产业链关联，俄蒙对中国的产业链依赖度较高

尽管中日、中韩关系起伏波动，但中日、中韩仍保持着较高的产业链关联。中国连续多年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对象国和最大进口来源国。^② 2024年，中韩贸易额达到3280.8亿美元，韩国超过日本，成为

^① 参见唐宜红、张鹏杨：《提升对外迁产业供应链的可控力：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问题研究》，《开放导报》2022年第4期，第7—14页。

^② 参见王玲一：《韩国何以成为中国第二大经贸合作伙伴》，上海社会科学院网站，2025年1月27日，<https://www.sass.org.cn/2025/0127/c1201a576082/page.htm> [2025-02-16]。

按国别排名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为3082.7亿美元，按国别排名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①中日贸易近年来下降较为明显，中国虽然仍然保持着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来源国，但从2023年开始，美国超过中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2024年仍然保持这一排名。^②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采取追随美国、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措施所带来的后果；^③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市场潜力的开发，一些日本企业积极融入中国市场，更多地采取当地采购、当地销售的“地产地销”模式，这一部分不再显现在双边贸易流量中。

从关联度来看，表3列出2021年东北亚各国（包括中日韩俄蒙）双边产业链关联指标，并以特朗普第一次执政开始的2017年作为对比。该表横向表示增加值来源方向，即经济体 r 对 s 输出的增加值在经济体 r 出口增加值总量和 s 进口增加值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纵向表示增加值吸收方向，即经济体 s 自 r 吸收的外部增加值在经济体 s 进口增加值总量和 r 出口增加值总量中所占的比重。^④例如第三行左起第一个数字，表示韩国（ r ）作为外部增加值来源被中国（ s ）吸收的部分，在韩国（ r ）出口增加值总量和中国（ s ）进口增加值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第三列上起第一个数字，则表示中国（ r ）作为外部增加值来源被韩国（ s ）吸收的部分，在韩国（ s ）进口增加值总量和中国（ r ）出口增加值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该指标可以衡量经济体 r 作为外部增加值来源被 s 吸收的部分，在 r 对外输出的全部增加值和 s 自外部吸收的全部增加值中的重要性，即可以反映来源方向的作用，也可以反映吸收方向的作用。

① 按地区和国别排名，2024年中国大陆前六大贸易对象分别为东盟、欧盟、美国、韩国、中国香港、日本，笔者使用的是按国别排名。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index.html> [2025-02-16]。

② 「報道発表 令和6年分」、財務省、令和7年1月30日、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4/2024_115.xml [2025-02-16]。

③ 参见李清如：《国际变局下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东北亚学刊》2024年第2期，第66—147页。

④ 参见李月、许宁宁、曹晋丽：《经济制裁对两岸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研究》，《国际贸易》2024年第5期，第59—73页。

表3 2021年1和2017年东北亚各国双边产业链关联指标

r \ s	2021 年				
	中国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蒙古
中国	—	11.27	9.06	6.99	1.52
日本	13.43	—	5.66	2.69	0.46
韩国	12.25	4.05	—	3.53	0.46
俄罗斯	7.97	2.62	2.46	—	1.83
蒙古	3.66	0.18	0.13	0.23	—
r \ s	2017 年				
	中国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蒙古
中国	—	11.51	7.67	8.01	1.56
日本	11.11	—	5.94	3.18	0.44
韩国	12.94	4.52	—	2.38	0.46
俄罗斯	5.44	4.70	2.35	—	1.86
蒙古	3.44	0.18	0.20	0.64	—

注：从横向看， $LINK_{rs} = VAEX_{rs} / \sqrt{VAEX_r \times VAIM_s} \times 100$ ；从纵向看， $LINK_{sr} = VAIM_{sr} / \sqrt{VAIM_s \times VAEX_r} \times 100$ 。其中， $VAEX_{rs}$ 表示经济体r向s输出的外部增加值， $VAIM_{sr}$ 表示经济体s自r吸收的外部增加值， $VAEX_r$ 表示经济体r的出口增加值总量， $VAIM_s$ 表示经济体s的进口增加值总量。

资料来源：“UIBE GVC Database”，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http://gvcdh.uibe.edu.cn> [2025-02-12]。

从表3可以看出，中日、中韩保持着较高的产业链关联，与2017年特朗普第一期执政开始时相比，2021年双边产业链关联没有明显的下降，甚至一些指标还出现上升。从日韩创造的增加值被中国吸收的部分来看，其在中国吸收的全部外部增加值和日韩对外输出的全部增加值中的重要性较高。这说明，中国是日韩对外输出增加值的主要市场，日韩是中国吸收外部增加值的主要来源，相对来说，中日产业链关联高于中韩产业链关联。从中国创造的增加值被日韩吸收的部分来看，其在中国对外输出的全部增加值和日韩吸收的全部外部增加值中也占有一定的分量，但不如日韩对中

国输出的产业链关联性强，且这一角度的中日产业链关联也高于中韩产业链关联。总结来看，中日、中韩互为增加值输出的重要市场和吸收外部增加值的重要来源，相对来说，日韩对中国输出增加值方向的关联性更强，中日产业链关联高于中韩产业链关联。

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蒙古国的产业链关联显著高于日俄、日蒙和韩俄、韩蒙的产业链关联，俄蒙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性较高。从俄蒙创造的增加值被中国吸收的部分来看，其在俄蒙对外输出的全部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较高，但在中国吸收的全部外部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因此相乘而来产业链关联不如中日、中韩高，这反映出俄蒙在增加值输出市场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从中国创造的增加值被俄蒙吸收的部分来看，其在俄蒙吸收的全部外部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较高，但在中国对外输出的全部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较低，因此相乘而来数值并不高，这反映出俄蒙在增加值供给来源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且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增加值吸收方的产业链关联要高于中国作为增加值供给方的产业链关联。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均保持着较高的产业链关联，尤其是作为增加值需求市场方面，中国在东北亚地区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日韩与中国也互为重要的增加值供给来源和需求市场。因此，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犹存的复杂国际背景下，东北亚地区加强产业链合作，对于维护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抵御外部冲击，还可以推动区域内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张 倩）